

新闻动态

标题新闻

美媒称美国应该为美中关系的根本性改变提出指导方针

据美国《福布斯》网站 12 月 3 日报道，曾在多国担任战略顾问的道格·舍恩认为中国试图在亚洲赢得同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超越美国。中国宣布建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做法就是为实现这个目标采取的最新举措，这震动了奥巴马政府。美国政府已经表示，它期望美国航空企业会遵守中国为新空防区域设置的规则。但美国官员争辩说，遵守并不意味着接受，美国需要提出更大胆的解决方案，以便让该地区的权力分享机制更有效地运作。

道格·舍恩在其文章中指出，回想习奥会之后奥巴马曾告诉美国人民，同习近平主席在涉及中国国家资助的网络黑客问题上取得进展是他的头等大事。结果，奥巴马试图在黑客问题上寻求合作，北京却否认中国牵涉其中。拜登会晤习近平有关防空识别区问题时可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亚洲的每个人都希望美国设法留在亚洲。。。。。美国需要显示，它有意图和责任这么做，并愿意同中国合作，美中关系发生根本性变化才有用。”文章认为美国应该为美中关系的根本性改变提出指导方针，同中国的老式外交肯定不合要求。

美军对华识别区软化，求与中方沟通

据多维新闻网 12 月 12 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威尔什三世（Mark Welsh）11 日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发表讲话时称，他不希望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冲突的平台，他希望这是一个交流的平台。他认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给予了美国一项伟大的使命，即更好地与中方互相交流消除潜在误解。如果美国划设的防空区与他国重叠的话也会传达错误信息。他表示，美中必须就防空区展开谈话，该谈话必须是国际性的，美国必须与盟友一同与中国展开谈话。当被问及中国是否可以执行防空区程序时，他称中国有能力在东海防空识别区内展开行动，显然，中国有相关装备。他还表示，美中必须讨论如何在不产生冲突的前提下在亚太地区共存。他指出，全球共同利益不仅在海上，还包括海事利益区包含的领空。美国必须学会如何在这些区域行动，他相信美国能学

会。他认为美国不应该将注意力放在潜在的冲突上，美国应该把焦点放在沟通的必要性上。他还认为，美中军事关系为两国诚实对话提供了另一个选项。他称，他不认为美中军事关系是美中关系的支柱，至少在短期内不是。但是美国希望美中军事关系能成为美中关系中的一部分，美中军事沟通能使美国消除对中国划设防空识别区的担忧。

美国作为东亚局势调停者的公信力值得怀疑

据西班牙中国政策观察网 12 月 9 日报道，美国副总统拜登的东亚之行似乎无助于缓解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引发的地区紧张局势，中国的这一举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东京继续紧绷神经，首尔则宣布扩大本国防空识别区，预计中国将对再设新的防空识别区慎重衡量。

隔岸观火的华盛顿再次将自己定位在了亚洲争端调停者的角色上，其主要目的是保障未来几年在其加强军事存在的海域的自由出入。但伴随这一战略的是两大疑问。首先，美国为加强地区一些国家的军事联盟和推动 TPP 等具有排外性质的经济一体化协议而在实际中推行区分和对立的政策，这些政策表明其渴望在地区内重新定位。第二，调停需要的是公信力，也就是各方对调停者客观意愿的信任，而美国不加掩饰的站队使得这成为了一个问题。当前美国想要在亚洲冲突中保持中立只是一种幻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在地区保持霸主地位和在世界范围内与那些决议抗衡新兴中国的国家加强同盟关系的使命。这一切并不出人意料，尽管面临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的美国在中期内能够拿出怎样的斡旋手段来兑现对地区各国的承诺以及这些国家将对美国的介入接受到何种程度尚未可知。

美学者认为美国亚洲战略应推行海外接触

据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 11 月 20 日报道，美国在菲律宾进一步建设基地遇到了困难，这主要是因为菲律宾国内对美国军事存在的顾虑。在现代军事背景下，美国实力的规划需要预先的承诺。即便军队能在短时间内实现部署，能够接收美国飞机、技术人员以及相关支援人员的基地也必须提前做好准备。尤其在危急情况下，能够提供有效制衡机会的机制可能不会快速显现。对于美国战略利益来说，幸运的是，美国海军在台风“海燕”之后提供的支援可能会赢得足够的善意来克服当地对更新美国军事作用的反对。然而，如果加强关系需要持续提供这样的支援，那海外制衡就会失去它的一些吸引力。如果从实际算起来，海外制衡需要的能力与获得前方主导权一样多，那它就没什么吸引力了。还需指出的是，如果帮助救灾就能有助于海外制衡，那中国完全可以靠更有力和热心的帮助来削弱美国的地位。

这样看来，更明智的做法可能是在前方的“深入接触”和海外制衡之间找到一条中间道路。海外接触保持了前方行动的能力，并强调了有益的多边主义，这样既实现了自己的目标，又符合更广泛的战略意义。然而，这从实质上来说还是防御性的，只是单纯防止竞争对手占据地区主导权，而不是在全球政治事务中占主导权。与海外制衡一样，它试图利用受威胁地区伙伴的准自然制衡行为，但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伙伴关系是需要培养的，不会一夜之间形成。

拜登亚洲行未能团结日韩以共同对抗中国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2月6日报道，美国希望中国的防空识别区能够使盟国日韩的关系更加紧密，但两国长期以来的敌对被证明难以克服。日韩两国都抗议中国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但是这看来并没有转变成捐弃前嫌的愿望。这种不满情绪可以追溯到日本战时对韩国领土的占领。

拜登敦促韩国总统朴槿惠重新考虑其对日本首相的冷淡态度，以使这三个盟国能够在加强地区安全方面进行合作。据韩国官员说，朴槿惠的反应是，日本需要首先显示出“真诚的行动”。美国官员认为，尽管关系持续冷却，但中国的举措明确提醒日韩两国注意，消除历史分歧和加强合作对两国都有利。奥巴马行政当局认为，它把工作重点重新转向亚洲，使美国能够为两国关系解冻助一臂之力。尽管如此，很少有人指望解决日韩之间严重的外交僵局能够一蹴而就。美国很可能会努力对日本施压，要求其承认这场纠纷，并开始与中国直接会谈，从而避免在中国和日本都提出领土要求的岛屿问题上擦枪走火。与此同时，美国面临着削减防务开支的压力，因而在加强其军事存在方面面临局限性，需要盟国在该地区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美媒称安倍承诺大幅增加对缅甸援助以抗衡中国地区影响力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网站12月15日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向缅甸提供630亿日元（约6.1亿美元）的最新援助，以支持缅甸主要工业区的发展。这是日本抗衡中国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最新举措。日本还承诺向越南——另一个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提供1000亿日元的援助。

安倍表示，日本将努力与缅甸和泰国合作，开发位于缅甸南部的土瓦工业区。分析人士称，日本在缅甸更加积极的角色很可能被中国看作美国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上，美日是反对声最大的国家之一。日本支持缅甸发展是其在东南亚推行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日本承诺未来5年向东南亚国家提供200亿美元的援助和开发贷款，并与这些国家的政府建立更密切的军事关系。到目前为止，中国仍然是缅甸最大的投资者。

中国在缅甸已经投资或承诺投资 142 亿美元，占有所有外国投资者的 1/3。相比之下，日本在缅甸的投资仅为 2.92 亿美元。但也有迹象表明中缅两国的经济关系日趋紧张。新加坡东南亚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中国问题专家约翰·李表示，中国在缅甸遭遇的挫折可能会为日本打开大门。但中国不太可能会撤出这样一个战略要地。他指出：“假如中国想继续在缅甸投钱，那么日本企业将很难获得立足之地。”

美媒揭露奥巴马 TPP 谈判窘境

根据《霍芬顿邮报》12 月 8 日披露的两份美国政府 TPP 谈判备忘录显示，奥巴马倡导的 TPP 谈判没有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而新的贸易条款也被认为将会增加处方药的价格以及弱化严格的银行监管体系。这两份备忘录详细记载了美国在与 12 个国家进行 TPP 谈判时产生的分歧议题，而这些议题也使得人们怀疑奥巴马能否如他所愿，在 2013 年年末完成与所有国家的 TPP 谈判工作。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议题就是是否允许外国公司挑战该国所设定的法规和监管。根据世贸条例规定，这项挑战政府法律的政治权利应当由主权国家保留，在诸如北美自贸区协定中，美国则支持这些企业拥有这些政治权利。而在 TPP 谈判中，这种权力可能会被放大。备忘录显示，在先前的谈判中，美国对这个问题非常强硬，不做任何妥协。此外，奥巴马政府也在努力减少外国政府对于资本管制的监管，其中包括了应用极为广泛的金融工具，从抑制市场过热的限制借贷到在金融恐慌期限限制国外资本流出的工具；而失去这些金融工具将会极大地限制政府预防和干预银行危机。备忘录显示，目前这些议程处于瘫痪状态，“美国政府处于‘零改变’的状态”。

辛迪加网站称人民币国际化刻不容缓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 12 月 12 日发表了加利福尼亚大学胡永泰的一篇文章。在中国，一场日益激烈的争论是人民币是否应该国际化，加入美元和欧元的行列成为国际媒介货币。与此有关的一场争论是上海是否能够成为顶级国际金融中心，与伦敦和纽约相抗衡。

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果断措施鼓励国际交易者和债权人用人民币为交易定价。具体而言，中国必须利用其市场实力促使用人民币相关出口制造品和原材料进口定价，并鼓励用人民币为中国购买的外国金融资产计价，但在此过程中需要规避诸多陷阱。正如 1997—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所表明的，资本账户自由化可能导致金融崩溃——这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反对者经常提到的危险。但这些风险尚不足以胜过金融开放的潜在好处，也可以通过有效监控和监管实现最小化。

最近成立的上海自由贸易区将允许离岸国际金融中心的出现，中国监管者将受到真实世界的训练。这将让他们获得识别危机发展信号、扼杀风险、有效处理倒闭金融机构资本重组所需要的工具。中国对国际媒介货币与国际金融中心的追求符合其自身利益，让人民币帮助满足世界对国际储备和风险多元化的需求能加强全球金融稳定。

美媒：美国监管机构出台重大改革方案

据《纽约时报》12月10日报道，“沃尔克规则”将使得华尔街更难进行可能再次威胁金融体系安全的高风险投机；该规则对银行的经营方式进行约束，禁止它们用自己的账户投机（即所谓的自营交易），并要求银行首席执行官承担更大责任。该规则能否起到阻止类似“伦敦鲸”事件重演的作用，关键将取决于监管机构如何执行该规则。发生在2012年的伦敦鲸事件，让摩根大通在衍生品交易中损失逾6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协会表示，这套“庞大、高度复杂而且繁重的法规”将导致提供某些金融服务的难度增大，而这些服务对金融体系并不构成风险。这一规定以美联储前任主席沃尔克的名字命名；沃尔克曾经想要禁止银行从事投机活动，他表示正是这类投机活动帮助引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一法规成为2010年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中争议最大的标志性法规之一，然而它还是经受住了参与拟定该法规的五家监管机构间的内讧、银行方面的游说以及试图加强这一法规的银行业批评者的压力。

近期美国智库对华动态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2月1日发布的《平衡而不遏制：面对中国崛起的美国战略》研究报告认为，由于中国与全球体系有着十分密切的经济联系，美国推行对华遏制并不可行。有鉴于此，报告建议华盛顿采取一种包含四方面的平衡战略。

美国进步中心12月2日主办了“美中在清洁空气和气候问题上合作”的研讨会，会议讨论了美中在环保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以及美国如何采取措施减少碳排放并推动美经济可持续增长。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于12月3日主办了“保障中国的能源安全”研讨会。会议分析了中国当前采用的能源安全战略，并预测了未来中国能源政策走向。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12月2日——4日主办了“优先建立互信与共赢合作”研讨会，与会嘉宾围绕“基于亚太地区利益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履行地区安全架构承诺”、“克服当前东

北亚和平稳定障碍”、“加强合作建立安全与开放的网络”等主题进行了小组讨论。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12 月 10 日发表了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高级人员一篇题为《为什么韩国需要修订自身防空识别区？》的文章。文章认为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很可能影响韩国未来几年的海洋安全规划，并将促使韩国对本国防空识别区进行修订。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12 月 11 日主办了“回顾 2013 年美中关系，蛇年、阳光之乡与压抑”研讨会。与会嘉宾回顾了 2013 年的美中关系，展望了 2014 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 2013 年 12 月 12 日发布的报告《中美安全关注调查：对方眼中的我》认为，中美两国民众及精英的态度正在双边安全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中美安全认知调查研究项目”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和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的合作课题，其通过在两国开展基础调研和举办研讨会，分析相关态度，为致力于减少未来双边关系冲突的决策者提供参考。

重点关注

中美应制定未来海上交通规则

编者按：奥巴马政府将“支点”向亚洲转移已经使中美两国在太平洋的关系紧张起来。鉴于海上军事活动在法律方面一直模棱两可，再加上由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和中国军事实力增长而造成的两军相遇事件日益频繁，中美两国应该带头建立具体、实用的“交通规则”，供两国军队在相遇时使用，以减少未来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中国宣布设立新的防空识别区使得东海本来就紧张的气氛雪上加霜。美国两架 B-52 轰炸机 11 月 26 日通过这一区域，进一步凸显这个有争议区域会带来的潜在冲突。这片形势日益严峻区域的政治现实十分可怕。

从法律的角度看，首先，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相互冲突的领土主权声索造成了东海局势复杂化。中国和日本都宣称拥有钓鱼岛。即使所有权清晰，一个国家在其领土周围的空间中拥有什么权利也进一步带来了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公约法》（中国和日本都是签署国），一个国家沿

海岸线的区域被分为几个区域——领海、毗连区和专属经济区，对于这些区域沿海国家行使着依次递减的控制权。管理这些区域的法律规则是决定国家是否有权在其上空飞行的基础。不足为奇的是，各国对法律规范的解释不同，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向其他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目前的紧张关系明显提醒人们，自 2001 年的撞机事件以来局势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当时，美国的一架 EP-3 侦察机与中国一架 F-8 拦截战斗机在中国南部海域上空相撞。在这桩发生在中国专属经济区的碰撞事件后，美方机组人员成功在中国领土上迫降，并在那里停留了 11 天。美国提供了精心设计的半道歉声明，避免承认有任何不当行为。紧张局势随后平息了，美国政府强烈否认它违反国际法让 EP-3 在中国专属经济区上空飞行，这源于长期以来对“司法权”的恐惧。2001 年的碰撞已经成为历史，但造成这一事件的大环境仍然存在。

今天，美中两国仍然没有明确的军方向沟通渠道，以有效应对不可预见的对抗。更重要的是，自 2001 年的撞机事件以来的 12 年时间里，中国的军事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海下、海上和上空都有相当多的动作。虽然中国还没有一支能够将力量投射到其海岸以外很远地方的蓝水海军，但它正在迅速构建一支现代化的、日益膨胀的舰队，这让邻国和美国都感到不安。美国与中国的其中几个邻国关系密切，并且坚定地支持海上自由。

南海受到不少于 6 个国家的主权声索的困扰，这些国家在渔业和自然资源方面拥有重大权益，这加剧了军事紧张关系。在东海，有争议的地理构成看上去有资格根据海洋法被称为“群岛”，而在南海，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不那么显著的地理构成，更不用说它们的主权归谁了。东北亚一些有争议的露出水面部分也可能仅仅是“礁石”，尤其是冲鸟礁和独岛/竹岛。

国际法可以帮助长期明确不同的主权声索，这应该被列为优先选项。与此同时，司法渠道无疑将是缓慢的——《联合国海洋公约法》花了几十年时间才得以起草并最终生效，更迫切的是，我们需要制定具体的措施，既是为了遏制冲突，又是为了创建渠道迅速解决对抗，以防止它们演变成危机。

鉴于海上军事活动在法律方面一直模棱两可，再加上由于美国咄咄逼人的军事演习和中国军事实力增长而造成的两军相遇事件日益频繁，美中两国应该带头建立具体、实用的“交通规则”，供两国军队在相遇时使用，以减少未来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奥巴马政府将“支点”向亚洲转移已经使美中在太平洋的关系紧张起来。美国声称这一支点并非旨在遏制中国，但北京的领导人对此深表怀疑。如无意外，美国将在未来十年都要与中国军方打交道，2001 年的撞机事件迄今没有重演，希望能保持这样。

(文章来源：12月2日日本《外交学者》杂志网站文章 作者：玛格丽特·K·刘易斯)

美国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副国务卿助理关于美国对东亚经济政策的发言

编者按：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首席副国务卿助理斯考特·马西尔 (Scot Marciel) 于2013年12月18日就奥巴马“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的东亚经济政策在参议院发表了证言。他在发言中表示美国有关部门意识到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是整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性支柱。

马西尔在12月18日的听证会上告诉参议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小组委员会：“总统提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明确的总体目标：维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环境，加强以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普世权利和自由为基础的地区秩序。”马西尔说，总统再平衡政策的经济支柱对于实现其首要议程——为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其他机会——至关重要，但也将使亚太地区国家获得可观的经济回报。

马西尔说，未来东亚——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很好。他说，美国国务院正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为经济引擎添薪加柴，同时应对可能的威胁。例如：

- 为促进环境可持续性，美国已推进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合作，要求提高能源效率、倡导建筑工程采取更高的环保标准、打击非法砍伐和减少野生动物贩运。

- 为应对该地区人类安全的经济层面的问题，美国支持亚太经合组织促进可持续的保健体系、建设供应链中应对灾害的适应能力并解决粮食保障问题。

- 为增加人力资源并扩大经济机会，美国正努力将中小企业与全球价值链联通、提高大学生的流动性并促进妇女的经济自主权。

马西尔说，美国国务院和美国驻该地区的外交使团正在努力克服这些难题，同时建立了跨部门商务工作组，尽可能以最高的效率和最富有成效的方式提供经济、商业、农业和贸易服务。他说，他们还在推动投资和旅游，举办投资推介研讨会，与该地区各地工商界领袖交流，以鼓励他们考虑到美国进行创造就业机会的投资，以及与美国服务提供商合作帮助潜在的投资者了解如何遵守美国法律和法规。马西尔补充说，美国国务院与亚太经合组织的地区经济体合作，全面落实自由贸易协议，继续推进东亚——太平洋地区更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环境。发言摘录如下：

意识到美国未来的繁荣稳定与东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息息相关，奥巴马总统做出了一项战略上的承诺，表明在他执政期间将会重新调整亚太地区的利益分配和投资项目。总统制定了一项以经济开放、和平解决争端、尊重权利平等的地区稳定繁荣的新秩序目标。

为达到这个目标，政府部门积极投身于亚太地区的各项事宜，包括参与各项经济活动。例如，总统奥巴马在 2013 年就会晤了 7 位亚洲国家最高领导人，副总统拜登于 12 月初拜访了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家；国务卿克里就职后 4 次出访亚洲地区。美国的许多政府部门高层负责人也先后在 2013 年出访亚洲。

我们从很多方面对我们的重新平衡战略做出了重要的努力，包括加快盟国的现代化建设、深化与中国等新生强国的紧密联系、加强局部地区制度建设以及促进民主和人权制度的完善。但是，早在 2011 年奥巴马在澳大利亚议会发表演讲时，总统就把战略调整的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因为亚太地区的繁荣稳定直接关系到他对国民做出的承诺——为美国民众提供就业岗位和机会的诺言能否兑现。正因为如此，战略重新调整背后的经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并且对美国国内和亚太地区有长远的影响。

过去的几十年中，亚太地区快速繁荣地发展起来。亚太地区的繁荣富强使得亿万人脱离贫困，并且亚太地区形成的创新经济体系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世界银行发言人预测，仅在今年，亚太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40%。预测者们预测在未来的 20 年内，亚太地区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50% 左右，并创造出亿万的新中产阶级消费者。

融入亚太地区充满活力的经济体系对美国经济的增长至关重要。我们要加强同各经济体的联系，并在许多领域都已经有所进展。例如，2008 到 2012 年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增长了 22%，远远超过全球贸易 13% 的增长率。仅在 2012 年，美国向亚太地区出口货物服务的总额就达到 5550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31%，这为美国民众创造了约 280 万个就业机会。

互相的直接经济投资有助于加强和巩固我们与亚太地区的联系，也表明了我们长久维护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发展、促进经济一体化的决心。迄今为止，美国是对亚太地区投资数目最大的外国经济体，2012 年达到了 6220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35%，投资范围涵盖了约三分之一的东盟国家。亚太地区在美国的投资数额在 2012 年也达到了 4220 亿美元，比 2008 年增长了 31%。在我们日益增长的私企对亚太地区的投资需求和亚太地区为美国市场提供潜在消费者的水乳交融的关系中，美国商人意识到与亚太地区维持稳定合作关系对于国内经济增长和提供就业机会至关重要。

尽管亚太地区向美国提供了无数的机遇与可能，但是两者的关系还面临挑战。双方都面临能源开采与保护环境问题。经济和人口的快速增长带来了地区性食物、水、矿产和能源的消耗，越发增加的工业和交通方面化石燃料的消耗造成了环境的极度污染。反过来，这些污染威胁人类健康，导致气候巨变。就政治安全角度考虑，地区争端随时会威胁到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与该地区长期繁荣稳定的关系与该地区的未来。有关部门意识到美国与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关系是整个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基础性支柱，因此我们必须投身于建设有利于双方的和谐稳定关系。

(文章来源：12月18日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 柯湘君编译)

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有望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编者按：白宫提名了马克斯·鲍卡斯作为下一任驻华大使处理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据美国媒体报道，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会为中美关系带来积极影响。

中国日益要求和美国平起平坐，在这个形势下，白宫提名了下一任驻华大使以处理中美关系这一最重要、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参议员马克斯·西本·鲍卡斯（Max Sieben Baucus）是来自蒙大拿州的美国资深参议员。他自1978年以来一直在美国参议院任职。他是蒙大拿州任职时间最长的联邦参议员，在任职时间最长的现任联邦参议员中排在第三位。参议员鲍卡斯是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税收联合委员会副主席以及参议院农业、食品和林业委员会成员。他还是参议院环境和公用事业委员会成员并担任该委员会运输和基础设施小组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在当选联邦参议员之前曾于1975年到1978年担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员。他还曾于1973年到1974年担任蒙大拿州众议院议员，是一名有影响力的民主党参议员。据媒体报道，鲍卡斯出任驻华大使会为中美关系带来三个好处：

第一，白宫可能对中美关系拥有更多控制权。

骆家辉接替前犹他州州长、总统候选人洪博培出任驻华大使至今，并将于2014年年初离任，届时鲍卡斯将接替骆家辉出任驻华大使。鲍卡斯是一名受人尊敬的民主党要员，和前几任驻华大使相比，他并不是默默无闻，他多次会见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鲍卡斯真正不同于前几任驻华大使，尤其是洪博培的地方在于，他几乎完全没有处理安全问题的经验。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研

究主管丹·布卢门撒尔称“提名鲍卡斯是个有趣的选择，毕竟中美安全竞赛愈演愈烈，而鲍卡斯在安全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经验”。虽然鲍卡斯肯定会恶补安全事务，但是他很有可能不会像前几任驻华大使那样经常干预白宫和五角大楼对军事和政治问题的处理。

第二，中国与美国国会的关系会有所改善。

中国领导人和美国总统打交道总是比和国会更自在。“中国领导人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国会，因为国会内部充满分歧，不同的人能够影响不同的事件。”帕特里克·邱伐内克（Patrick Chovanec，中文名为程致宇）说道，他是 Silvercrest 资产管理集团首席战略官，曾在北京清华大学教经济学。鲍卡斯在参议院任职长达 35 年，他可以帮助减轻国会对中国在美投资行为的担忧，和美国在中国遭遇不公平贸易待遇的担忧。邱伐内克称，“找个了解国会，并且在国会具备影响力、人脉广泛的人当驻华大使，很有可能促进中美关系经济层面的发展”。

第三，中国对此或无争议。

相比军事安全、人权问题，中国在处理贸易这个双边问题时总是更为得心应手。2012 年 10 月鲍卡斯所在的参议院办公室发布了题为《鲍卡斯敦促中国高官处理贸易问题，开放市场接纳蒙大拿州牛肉》的新闻稿，这一事件并未引起中国官员的不安。鲍卡斯善于言辞，一直致力于促进参议院达成内部协议。奥巴马总统标志性的医改措施得以在国会通过，他功不可没。鲍卡斯沉稳内敛，不喜出风头，他如果像前几任驻华大使强调的那样，和中国人民建立密切关系，北京将会更乐于接受他。骆家辉坐经济舱、手提行李和在星巴克排队的照片在中国走红，洪博培骑摩托车穿梭于上海的街道，有时还会骑自行车去中国外交部开会。鲍卡斯可能会更低调些。

（文章来源：12 月 18 日美国《外交政策》网站，作者：艾萨克·斯通·菲什，刘振宇编译）

美国国家安全局丑闻重创美国公司在华运营

编者按：美国在华科技企业对于地缘政治的风向变化已司空见惯，但 2013 年美国国家安全局丑闻让这些企业受到了难以修复的重创。通过和中国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可以度过斯诺登事件后的困难时期。美国科技企业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全新的、部分由斯诺登事件带来的现实情况——在华市场份额大幅下滑，而知识产权保护只能延缓它的下滑过程。

今年 6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加州举行峰会后，奥巴马政府强烈暗示

网络安全是两国之间的首要关切问题。

这对于美国企业而言是一个艰难的突破。之前，美国商界曾试图将商业网络间谍活动上升为公众事件。2013年初，形势终于出现了有利的变化。

今年2月，美国网络公司曼迪安特（Mandiant）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去七年里中国政府在150家美国企业和机构从事间谍活动。5月，美国国防部国防科学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中国可以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美国国防部武器和战机的详细设计图。

在这一系列事件曝光之后，奥巴马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敦促中国停止此类行为，并要求中国在六月的峰会上拿出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爱德华·斯诺登向媒体提供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从事间谍活动的文件。

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斯诺登的出现让事情变得非常糟糕。6月5日，英国的《卫报》首先刊载了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报道。而当两天后中美加州峰会举行时，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已名誉扫地。

加州峰会并没有给奥巴马在知识产权问题上敲打中国的机会。相反，美国似乎采取了防守姿态。有媒体报道，习近平主席因担心被窃听而选择住在会场外的凯悦酒店。媒体猜测这让会谈气氛发生了变化。

加州峰会之后，中国政府在媒体上通过“去思科化”大量报道对美国科技企业不利的新闻。思科公司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许多中国的地方政府研发并改进信息技术基础设施。打击了思科之后，中国政府触及了美中科技和经济合作的核心。

此番对美国科技企业的打击开始于《中国经济周刊》上一篇题为“他正在盯着你”的报道，该文列出了八家美国企业作为“哨兵”渗透进了中国市场：苹果、思科、谷歌、IBM、英特尔、微软、甲骨文和高通。其中思科被认为是八家公司中“最可怕的”，因为中国的政府部门和金融机构大量使用该公司的产品。

对于这些美国科技企业而言，中国是其全球范围内一个快速增长的市场。在中国媒体的负面宣传之后，这些企业的销售量迅速下滑。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思科在11月公布了第三季度财报，显示来自中国的订单数量比去年同期下滑18%，并预计整体收入会下降8%—10%。IBM的报告显示中国市场的收入下降了22%，整体利润下滑4%。而微软则表示中国已成为其增长最差的市场。

不过，一些美国小型科技企业在华业务并没有大幅萎缩。思科的竞争对手瞻博网络公司（Juniper Networks）以及一家存储系统制造商易安信公司（EMC）的业务在第三季度均有所增长。

随着中国政府持续限制“哨兵”企业，中国国内企业开始寻求与外国小型企业开展合作，有些甚至抛开外企，自行开展业务。不过，中国“去思科化”的代价很高，因为思科的网络系统已经深入全国。

斯诺登事件给中国国内企业带来了大量机会，比如，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的股价（中软股份）自6月以来上涨了250%。此外，中国政府继续推进科技产业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政府一直在超级计算机和卫星导航领域投入。不过，中国在网络安全上的投资目前还无法和美国相比。根据网康公司（Netentsec）首席执行官袁沈钢的数据，美国政府每年在网络安全上投入65亿美元，而中国只有4亿美元，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太久。中国政府在网络间谍活动和网络安全上的投入不断增长，这对中国的科技企业有很大的帮助。随着中国国内企业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会慢慢降低对美国八家“哨兵”企业的依赖。

11月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升网络能力可能是该委员会的任务之一。该委员会由习近平领导，模仿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旨在加强中央协调，提升快速反应能力，但其关注点是国内还是国外还不得而知。三中全会同时决定进一步改革开放，包括在一些领域鼓励竞争。中国的领导层继续着力吸引外资，比如刚刚成立的上海自贸区。不过，由于斯诺登事件，外国科技企业不像其他领域的企业那么受欢迎。

随着2013年即将结束，美中两国为本国利益考虑而进行大量间谍活动已众人皆知。但中国的间谍活动在一个关键方面和美国不同：一般认为，美国政府不会将所侦察到的信息告知美国企业，但中国的企业可以获知国家侦察到的信息，从而了解许多美国企业的情报。通过和中国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达成共识，美国可以度过斯诺登事件后的困难时期。美国科技企业必须准备好面对一个全新的、部分由斯诺登事件带来的现实情况——在华市场份额大幅下滑，而知识产权保护只能延缓它的下滑过程。

（文章来源：12月12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网站 作者：李成、麦瑞安，梁辰编译）

（新闻部分编译：刘振宇、梁辰、柯湘君等）

焦点分析

东亚紧张局势考验美国亚太外交战略

核心提示：奥巴马的“再平衡”政策一直以来好像更多是一种说法，没有体现在实际当中。副总统拜登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访使奥巴马政府迎来又一个充实该政策的机会。如果美国不能够在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可能导致风险进一步升高。美国应当考虑到不要给东亚国家造成“埋头中东事务，对东亚的安全稳定态度消极”这样的印象。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东亚才是最重要的地区。

11月六国与伊朗就伊朗问题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在避免中东出现核扩散及新的战争这一点上具有重要意义。美国现行中东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禁止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严防伊拉克爆发宗教对立；稳定埃及局势促其早日成为民主国家；将与沙特的分歧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在外交政策专家和风险分析人士专注于同伊朗进行核谈判的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中日之间动荡海域中的几座荒岛又引爆了下一场重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为了强化对中国试图控制相关岛屿上方空域的抗议，美国派出了两架B-52。这也是一个及时的提醒，让人们看到奥巴马总统希望改变以往埋首中东问题的做法，将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东边。奥巴马的“再平衡”政策一直以来好像更多是一种说法，没有体现在实际当中。然而，副总统拜登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出访使奥巴马政府迎来又一个充实该政策的机会。

奥巴马政府应当认识到，对于世界经济的未来，东亚才是最重要的地区。全球增长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是中国，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在实力强劲的民主国家中，美国最大的友好国家日本的经济也在逐步回升。而全球最为成熟的新兴市场国家韩国则在力求与日中构建稳定的关系。

但中国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东海上空划设防空识别区一事使得人们再次认识到，这个公认的最繁荣的地区仍然存在无法消除的对立。

“在我看来，尚不明朗的是，他们是把它看做中日之间一个需要管控的问题，还是一次与北京方面的长期意志较量，” 乔治·W·布什总统时期的亚洲事务顾问、现供职于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迈克尔·J·格林说。格林表示，如果是后者，美国则必须在该地区投送军事力量，提升包括与日本和菲律宾在内的盟友的防御能力，同时与环绕中国沿海水域的各个国家结盟，结成统一战线来对抗北京的咄咄逼人之势。他补充说，麻烦在于“奥巴马政府很怕自己看上去是在遏制中国”。

在预测拜登将要传达的讯号时，奥巴马政府的一名高官说：“目前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中国的邻国对此很不安。” 他补充说，“同样，美国副总统不是到北京去耍外交手腕的”。“政府传达了一些成分复杂的讯息，突显了奥巴马亚洲政策包含的微妙平衡，既要与中国合作，又要遏制中国”。在中国最近一次发出挑衅之前，国家安全顾问苏珊·E·赖斯曾表示，美国正在寻求一种新的大国关系模式。“这意味着”，她在首次就亚洲事务发表演讲时说，“在管控不可避免的竞争的同时，我们要在涉及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建立更深入的合作”。谈到中国和邻国之间的领土争端时，赖斯敦促“各方摒弃高压手段和挑衅，根据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来追求自己的主张”。这些争端不仅包括中日之间的东海争端，也包括中国与菲律宾及越南的南海争端。

日中韩三国一方面试图将摩擦限定在可控范围内，一方面又凭借在外交层面采取强硬言论和行动赢得更多的国内支持。虽然任何一方都不希望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但又都没有能力掌控本国对于对方言行所做出的反应。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李成说：“中国的社交媒体、官方和半官方媒体都在大幅宣扬此次争端。美国对主权问题在亚洲国家心目中的分量缺乏了解。”紧张态势很可能会加剧。中国海军已将唯一的一艘航母派往南海。在东海，一支美军航母舰队正准备和日本战舰一起展开计划已久的海军演习。一些专家表示，鉴于在竞争已达白热化的水域聚集了如此密集的火力，双方都面临着真正的误判风险。中国问题专家说，对于涉事各方来说，好消息是，相比大力整治中国经济，习近平对军事冒险的兴趣要小得多。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李成说：“发生真实战争的几率依然是相当低的。不过，意外事件有时会把领导人逼到死角。”

在这样的局面下，如果美国不能够在缓解紧张局势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有可能导致风险进一步升高。所以美国应当考虑到不要给东亚国家造成“埋头中东事务，对东亚的安全稳定态度消极”这样的印象。

那么东亚的势力均衡将会发生怎样的倾斜呢？这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外交战略重心，也就是“重返亚洲”战略的走向。而这一政策支柱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该协定潜藏着促进太平洋两岸维持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

奥巴马总统原本计划在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给 TPP 协议的签署加把劲，

但却因为华盛顿的党派斗争而未能成行。之后白宫宣布了奥巴马将于明年4月访问亚洲。届时美国应当强势宣布，其未来仍将扮演亚洲安保与贸易的主角。

而且奥巴马还应当显示出对于 TPP 成员国扩大同中国贸易的积极态度，传递出美国希望日中韩缔结自由贸易协定的信号。这或许能够说服中国，美国重返亚洲及 TPP 协议的签署并非是出于孤立中国和遏制其发展的需要。无论如何，自贸协定有助于降低日中韩对立的风险、促进合作的契机。

来自北朝鲜的各种威胁也有可能成为促使日中韩进行紧密合作的原因。朝鲜半岛的统一不仅复杂，而且是重中之重。日美中韩为保护本国利益、避免局势失控、维持地区经济的增长，除了合作以外没有其它选项。各国必须在东亚地区建立起更高层级的合作。

（文章来源：12月8日《每日新闻》与11月28日《纽约时报》 作者：伊恩·布雷默，马克·兰德勒）

本刊编者注：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主编的观点，仅供读者参考。